

残疾人竞技体育的百年掠影、演进特征与经验启示

曹际玮^{1, 2}, 王超¹, 茹晓阳³, 胡庆山³

(1.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2.湖北休闲体育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62;
3.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采用文献调研、历史分析、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残疾人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演进特征及经验启示进行探讨。研究认为:残疾人竞技体育在区域性赛事中因势而生、在国际运动会中日臻完善、在全球盛会中和合共生,呈现出竞技目标与价值同步提升、竞技环境与组织动态跟进、竞技规模与项目逐渐扩容的演进特征。以个性化参与为模板,激活残疾人优势潜能;以污名化消解为导向,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入;以共生性社会为目标,构建包容型体育生态是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历史经验启示。

关键词:竞技体育; 演进特征; 历史经验; 残疾人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4-0060-07

Century glimpse, evolution features,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for competitive sports with disabled persons

CAO Jiwei^{1,2}, WANG Chao¹, RU Xiaoyang³, HU Qingshan³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2.Hubei Leisure Sport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62, China; 3.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evolution features and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for disabled persons were studied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historical analysis, logical analysi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ompetitive sports for disabled persons have been born out of regional events, perfected in international games, and co-existed in global events, showing the following evolution features of simultaneous enhancement of athletic goals and values, dynamic follow-up of athletic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s, and gradual expansion of athletic scales and program. And the study also holds that activating the advantageous potentials of disabled persons with the template of personalized participation; promoting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abled persons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stigma elimination; and constructing an inclusive sports ecosystem with the goal of a symbiotic society, will being a reve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for disabled persons.

Key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evolution featur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disabled persons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Mandela)指出:“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它能鼓舞人心,团结社会,并为人类带来希望。”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不仅凸显体育作为康复工具的独特价值,更彰显体育在推动社会包容与改革、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作用。20

世纪上半叶的战后社会背景下,残疾人竞技体育初现成为改善战后残疾军人生活质量、促进身体机能恢复与社会生活融入的手段,渐趋引起欧美社会福利工作者的重视。尔后,随着国际残奥会等赛事的浮现,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功能不断扩展,逐渐成为残疾人展示

个人价值、争取社会平等的重要平台。通过竞技体育所搭建的展演平台, 残疾人群体表现出超越身体局限的韧性与拼搏精神, 从而推动全球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认可与接纳。诚如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Bach)所言: “体育能带来社会变革, 并推动人类追求更公平和包容的未来。”如今, 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扩大, 愈趋成为促进全球共融与残疾人权利进步的关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让广大残疾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不仅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 更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1]。站在残疾人竞技体育百年发展的历史节点之上, 回望残疾人竞技体育实践的百年掠影, 归纳残疾人竞技体育实践的演进特征, 总结残疾人竞技体育实践的历史经验, 对助推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 促进残疾人体育理论创新, 优化残疾人体育治理,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全民健身、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1 历史回眸: 残疾人竞技体育的百年掠影

以重大事件发生时间为节点划分历史阶段是史学研究常见的分期方式, 在我国人文社科研究中多有体现^[2]。基于此, 将残疾人竞技体育的重要历史事件有序纳入并进行调整与细化发现, 残疾人竞技体育历经区域性赛事中因势而生(1924—1959年)、国际运动会中日臻完善(1960—1988年)、全球盛会中和合共生(1989至今)的百年历程。

1.1 因势而生(1924—1959年): 以矫正身体与康复为初衷的区域性赛事

20世纪初,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城市工业化发展导致军人和工人中的伤残数量大幅增加, 社会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新的康复手段恢复其工作能力与生活能力。其间, 运动医疗的出现与发展使残疾人的康复成为可能。一份康复训练记录记载: “伤残军人治愈后体质仍然很弱, 应通过参加体操练习改善他们的体质状况和精神面貌。”^[3]此一阶段, 体育运动成为矫正身体功能与康复治疗的有效手段, 通过专门设计的运动项目残疾人得以恢复身体机能、增强体质。彼时射箭、游泳、田径、自行车、轮椅运动被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广而出, 这些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帮助患者恢复身体机能, 还能通过竞技项目重建自信心和社交能力^[4]。

1924年国际聋人体育联合会(ISFD,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Sports for the Deaf)在巴黎成立,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为残疾人体育设立的国际体育组织。同

年, 在该组织的领导下第一届聋人奥林匹克运动会(Deaflympics, 以下简称聋奥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并成为区域性赛事的开端。首届聋奥会吸引欧洲9国145人参赛, 涵盖田径、游泳、摔跤等多个项目。此后, ISFD通过定期举办聋奥会和区域性聋人运动赛事, 推动着世界各地残疾人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 由此残疾人竞技体育正式进入国际体育体系^[5]。

1948年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的医生路德维希·古特曼(Ludwig Guttmann)为二战伤残退伍军人组织举办了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Stoke Mandeville Games), 这一赛事被视为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Paralympic Games)的前身。如有学者认为: “古特曼通过体育竞技为战争伤残军人提供一个恢复身体和心灵的渠道, 体育不仅是一种康复手段, 更是帮助他们重回社会的关键。”^[6]1959年国际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Stoke Mandeville Wheelchair Sports Federation)成立, 该组织专注于推动残疾人体育运动的竞技化和职业化, 通过举办区域性和国际性赛事使残疾人竞技体育得到进一步普及^[6]。此一阶段, 区域性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促使更多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也彰显国际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注与支持。

1.2 日臻完善(1960—1988年): 以残疾人竞技体育为导向的国际运动会

1960年第一届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Paralympic Games, 以下简称残奥会)正式在罗马举行, 标志着残疾人竞技体育迈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奠定残疾人竞技体育国际化的基础, 为更多残疾运动员提供国际竞技舞台, 进而成为残疾人竞技体育从区域性赛事向国际性体育赛事转变的关键一步^[7]。1964年东京残奥会首次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同一城市、同一时间举行, 进一步推动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全球化进程。1968年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Eunice Kennedy Shriver)创办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Special Olympics, 简称: 特奥会), 该项赛事致力于为智力障碍者提供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 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提升社交能力并促进身心健康。1975年第一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Far East and South Pacific Gam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在日本大分举办, 成为亚太地区残疾人重要的国际赛事。这一赛事面向远东和南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残疾运动员, 为该区域内的残疾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重要平台。1976年虽迟但到的冬残奥会在冬奥会举办52年后终在瑞典的恩舍尔兹维克举行。上述赛事共同促进国际残疾人竞技体育交流, 并帮助残疾人通过体育建立国际合作网络, 推动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多元化与系统化进程。

1960—1988 年残疾人竞技体育趋向国际化发展，各国政府和体育组织通过参与国际赛事与合作，逐渐认识到建立统一的体育标准与规范的重要性。其间，国际赛事的不断扩展，特别是残奥会等国际性赛事的繁荣，促使各国对赛事规则、技术标准以及运动员资格等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与协调，从而推动残疾人体育赛事的标准化进程。如残疾人竞技体育中的比赛设备、轮椅设计以及项目分类，在这一阶段通过国际组织的协商与实践逐步得以规范^[8-9]。此一阶段残疾人竞技体育不仅迎来赛事规模的扩张，也推动全球范围内残疾人体育赛事的标准化进程，为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3 和合共生(1989 年至今)：以残奥为主导各国广泛参与的全球盛会

1989 年是残疾人体育史上的重要节点，国际残奥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以下简称 IPC)与国际奥委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以下简称 IOC)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残奥会与奥运会开始同步举办，标志着残疾人体育运动融入全球主流体育的框架^[10]。这一时期 IPC 通过顶层设计和全球协同机制，为各国政府提供残疾人竞技体育发展参考框架。具体而言，IPC 通过培训、技术支持和教育推广，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提升了残疾人竞技运动的水平。这种全球性的治理机制不仅保障残疾人体育的公平性，也为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11]。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 IPC 的统筹计划下大型残障人体育赛事日渐增加，使得更多残障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21 世纪后残疾人竞技体育进入全球发展的深化阶段，其间，国际组织与政府机构共同协作，形成以残奥为主导、各国广泛参与的全球盛会。2001 年 IOC 与 IPC 签署一项协议，以确保残奥会的发展与延续——自 2008 年起，奥运会结束后残奥会将在同一城市、使用相同的场馆和体育设施举行，此举进一步巩固残奥会在全球体育赛事中的地位，并推动残疾人体育与主流体育融合。这一时期，许多地区与国家开始将残疾人竞技体育纳入国家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残疾人体育事务，深入开展残疾人竞技体育国际交流。如日本通过 TID 计划、J-STAR 计划发掘有潜质的残奥运动员，并在经费投入、场地设施及培养体系等诸多方面进行积极改进，以推动残疾人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12]。再如，中国通过北京残奥会、上海特奥会、杭州亚残运会等大型残疾人体育赛事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残疾人组织交流合作，广泛弘扬了“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让“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

口号响彻寰球，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评价^[13]。

2 历史转向：残疾人竞技体育的演进特征

2.1 从“康复健身”到“人权保障”再到“超越自我”：竞技目标与价值同步提升

残疾人体育运动的发展，不仅是竞技层面的演进，更是残疾人群体在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和权利主张等多方面的转变与进步^[14]。这一过程中，残疾人竞技体育的目标要义从最初的“康复健身”逐渐过渡到“人权保障”，最终达到“超越自我”的崇高追求。这一主体性转向反映残疾人在体育中实现自我价值，并逐步赢得社会认可与尊重的过程。具体而言，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初衷是作为康复与健身的工具，帮助因战争、工伤或疾病导致身体机能受损的残疾人恢复生活能力。在此，体育活动作为一种“运动处方”，被广泛用于改善残疾人的身体功能和心理状态，尤其是在战后康复领域，体育成为辅助医学治疗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时期，残疾人体育活动的内容也多以功能性训练和康复性运动为主，竞技和社交功能尚未完全显现。

随着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发展，其功能逐渐超越单纯的康复与健身范畴，进而被社会认识到其作为社会表达与权利争取载体的重要性^[15]。20 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全球人权运动的兴起，残疾人群体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竞技体育成为残疾人争取社会平等与人权保障的舞台。人权保障成为这一阶段残疾人体育运动的核心议题，推动着全球范围内残疾人权益的提升。1970 年日本出台《智力、肢体残疾人基本政策法》，明确指出残疾人的体育参与权并为其提供场地、资金支持。1973 年美国颁布《康复法》(Rehabilitation Act)，要求充分给予残疾人体育活动和竞技运动的权利。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大会相继通过《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和《残疾人机会平等标准规则》，使得残疾人体育参与的权利更是得到了明确的法律认可和保障。由此而言，体育作为人权的载体不仅改变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也使残疾人获得更多的社会参与机会，进而提升残疾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16]。

在通过体育争取人权保障的基础上，残疾人竞技体育逐渐走向“超越自我”的崇高追求，这不仅是残疾人自身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探索，也体现人类社会对体育本质内涵的更高认识。在这一发展阶段，体育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活动形式，深刻影响并塑造着每个人的生活，尤其对残疾人群体而言体育的意义不仅局限于运动本身，更成为他们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促进社会共同进步的桥梁^[13]。一方面，竞技体育可以为残疾人提供运动的目标感和成就感，特别是在竞

技过程中通过克服身体障碍和挑战运动极限, 残疾人能够不断实现对自我能力的重新定义, 这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内核成为他们应对生活困难、重建人生意义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 残疾人竞技体育让全球观众看到残疾人卓越的运动水平, 也促使公众对残疾人潜力有更深刻的认识——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突破社会对“弱者”的刻板印象, 向世界传递生命的坚韧与多样性价值。

2.2 从“质疑批判”到“包容发展”再到“平等共享”: 竞技环境与组织动态跟进

20世纪初期, 残疾人常被视为需要社会照顾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运动能力与竞技权利几乎未得到承认。在体育领域健全的身体能力被视为核心标准, 因而残疾人长期被排除在主流体育之外。这种排斥反映出当时社会对残疾人能力根深蒂固的质疑与偏见——残疾人体育活动无异于“同情性的展示”, 而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竞技体育^[17]。这一时期, 体育活动主要由残疾人体育俱乐部和运动协会开展, 而在这些组织助力下残疾人体育逐渐从个别地区的康复性活动发展为具有组织性的、区域性规模的竞技实践^[18]。20世纪后期, 美国医学研究者乔治·恩格尔(George L·Engel)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模型, 强调残疾现象具有相对性——残疾与非残疾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标准或泾渭分明的界限。此后, 西方许多国家用“people with disabilities”取代“disabled persons”, 这一词语的更替无疑是倡导“社会尊重和关怀”的重要转变。在此背景下, 残疾模式也向前迈出历史性一步, 即人们不再视残疾为“个人悲剧”, 而是开始检讨“社会的残疾”并提出残疾的“社会模式”^[19]。

随着残疾人竞技体育逐渐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社会对这一领域的态度实现从“质疑批判”到“包容发展”^[20]的重要转变。在此过程中, 国际组织的多维度支持推动残疾人竞技体育的纵深发展。一方面,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IPC)、国际残疾人体育联合会(IWAS)等组织通过标准化建设打破发展壁垒。如IPC发布的《国际残奥委会宪章》从基础设施、训练体系到赛事服务形成全链条操作规范, 以帮助各国建立统一的残疾人体育发展基准; IWAS等机构则通过倡导、技术培训以及提供训练经费与比赛补助等方式, 极大地缩小不同区域间的竞技体育发展差距。另一方面, 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社会观念重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宣言》将残疾人体育纳入可持续发展议程, 促使多个国家修订反歧视法案。申言之, 在“包容发展”阶段残疾人竞技体育不仅是一种竞技活动, 更成为促进社会包容与文化多元化的

有力工具。

随着全球社会对残疾人权利的不断重视, 残疾人竞技体育的运动理念逐步从包容发展转向平等共享——残疾人不再仅仅被视为社会中需要关怀的对象, 而是平等的参与者和贡献者^[21]。“平等共享”理念的核心在于, 残疾人享有与所有人平等参与文化体育生活的权利。此一阶段, 各国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设施与保障机制, 以确保残疾人能够平等地参与体育活动并从中获益。在基础设施方面, 无障碍体育设施建设是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基本前提, 包括轮椅通道、无障碍更衣室、低位座席观赛区以及适配性运动器材等。这些基础设施的投入, 不仅为残疾人提供更多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 也为残疾人观赛、社交等多元化需求创造条件。同时, 各国政府通过确立残疾人运动员培养与保障机制, 为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其中, 专项资金支持、医疗康复服务、专业教练团队配置以及生活补贴等措施, 为残疾人运动员提供从基层培训到高水平竞技的全周期支持^[22]。概言之, 社会对残疾人竞技体育的态度经历质疑与批判后, 逐渐走向包容性发展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着平等共享的价值导向。这一理念转变背后, 是社会对残疾人权利、价值和贡献的重新审视, 以及全球人权与社会正义观念的不断进步。

2.3 从“区域赛事”到“国际运动”再到“全球盛会”: 竞技规模与项目逐渐扩容

欧洲的区域性赛事不仅是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开端, 更是残疾人竞技体育规模与项目逐渐扩容的催化剂。其中, 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典型案例。1948年首届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仅吸引16名英国退伍军人参加, 该项赛事最初旨在通过体育竞技帮助脊髓损伤患者恢复身体功能与心理自信。在随后几年, 这项赛事吸引荷兰、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的残疾人运动员积极参与, 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欧洲代表性的残疾人竞技体育平台。尔后, 随着赛事规模的扩大其规则体系也不断完善, 涵盖场地要求、设备适配、参赛条件等多个方面^[23]。这些努力为残疾人体育项目的系统化与标准化提供基础, 也为更大规模的国际赛事奠定管理框架。

残疾人竞技体育从区域走向国际的过程, 不仅是自身发展规模的日益壮大, 也是推动全球残疾人权益平等、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其间, 国际残奥委员会(IPC)通过制定标准化的比赛规则、分类分级体系以及规范的参赛流程, 为全球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9-10]。具体而言, IPC的分级标准涵盖运动员的功能性障碍与竞技表现之间的科学

评估，这种分类体系的统一不仅确保赛事的公平性，也为区域赛事与国际赛事的接轨提供重要保障。例如，在许多区域性赛事中优秀选手会被优先推荐参加聋奥会、特奥会以及残奥会等全球性赛事。与此同时，愈趋规范的参赛流程减少各国和地区间在赛事组织上的差异，提升运动员对国际赛事规则、节奏与环境的适应能力，进一步增强区域赛事与国际赛事之间的联动。

21 世纪以来，残奥会等大型赛事的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残疾人竞技体育逐渐从国际运动转变为全球盛会，此一阶段残疾人竞技体育呈现出项目多样化、技术现代化、传播多元化等发展特征。其一，残疾人竞技体育的赛事项目在数量和形式上逐步多样化，涵盖田径、游泳、击剑、皮划艇、滑雪等 28 个大项与 600 多个小项。项目设置与运动分级的日趋精细化，使得不同残障程度的运动员能够在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展示自身的竞技水平。其二，科技进步带来更专业的运动设备，如智能假肢、个性化轮椅等辅助器材的普及，不仅帮助运动员提高竞技表现，也推动训练方法和比赛策略的革新。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残疾人运动员的竞技水准得到显著提升，相关运动成绩屡屡被刷新，部分项目甚至接近或超越健全运动员的水平。其三，媒体传播进一步加速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全球化——现代媒体通过广泛报道残奥会等赛事，提升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公众关注度，进一步助力全球残疾人体育事业的繁荣^[23]。概言之，残疾人竞技体育从“区域赛事”到“国际运动”，再到“全球盛会”的动力转换，体现残疾人体育在竞技、科技、媒体等层面的全方位发展，展示残疾人通过体育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参与的综合能力。

3 历史镜鉴：残疾人竞技体育的经验启示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新残疾观对残疾做出全新的理解和诠释，强调残疾人需要身心群的整体发展，强调残疾人全面融入社会^[24]。该模式既保留基于损伤的医疗模式的合理成分，又纳入强调环境的社会模式的视野，较为全面地概括出“残疾”的特点，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新残疾观。基于此，从“生物-心理-社会”3 个维度总结残疾人竞技体育的经验启示。

3.1 强身体之基：以个性化参与为模板，激活残疾人优势潜能

新时代呼唤新理念，在残疾人体育发展领域构建以“身心群协同共进”为核心的现代体育观，正成为突破传统生物医学视角局限的关键路径^[24]。这一理念摒弃“一刀切”的刻板模式，转而从生命科学的本质规律出发，通过体育运动的独特功能激活残疾人群体

的差异化潜能。在此，生命科学揭示人体具备强大的生理代偿机制——当某一感官或肢体功能受限时神经系统会启动补偿性调节，通过强化其他感官的敏锐度或运动系统的协同性，形成新的生命平衡态。以视障运动员为例，其听觉定位能力远超常人精度，触觉反馈系统亦展现出超常灵敏性，听障运动员则普遍具备更敏锐的视觉捕捉能力。这些生理现象印证生命系统自我优化的内在规律，为残疾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由此而言，体育作为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核心要义在于尊重个体差异，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不应采用生搬硬套的标准化模式，而应立足于残疾人群体的身心特点，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的体育参与方案。通过科学评估每位残疾人的身体机能、运动能力和心理特征，充分发挥其优势潜能、弥补功能缺陷，最终实现残疾人极具鲜明个性特征的和谐发展。这既是生命科学给予的启示，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3.2 淬心性之坚：以污名化消解为导向，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入

污名化及面子文化导致残疾人及其家庭产生社会退却行为，导致残疾人社会参与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25]。于此背景之下，残疾人竞技体育实现对个体生活的弥合与重构，展示出个体自信、自强、自立的生活风貌。如中国香港残疾人运动员苏桦伟参加 5 次残奥会，在其中的 4 届残奥会上共拿下 6 块奥运金牌并数次打破世界纪录，他的故事也被搬上荧幕成为透视残疾人运动员成长之路的平面镜。在此，残疾人体育运动生于竞技却高于竞技，给残疾人家庭带来希望和暖色^[26]，而体育的参与性、挑战性和群体互动性也促使残障群体在心理和社会适应等诸多方面获得积极发展。如特奥会不仅为智力残障人士提供一个平等参与竞技的平台，还通过健康计划和教育项目等多项举措，帮助残疾人提高生活技能和健康水平，从而为减少社会偏见、消解群体歧视铺设更加宽广的社会融合之路^[27]。

在体育运动的语境中，运动是身体、身体是运动，运动是“活”的身体的直接表达^[28]。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运动更具特殊意义——是残障人士突破身体局限、重塑自我的关键路径。通过竞技运动，他们不仅超越身体限制，更实现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深层次的精神蜕变。换言之，残疾人借助竞技运动这一载体开启一场“自我塑造”的历程，这不仅是生理上的挑战，更是心理与情感上的重建。其间，个体逐渐摆脱对身体缺陷的焦虑和自卑，建立对自我能力的肯定，从而发现自身的独特价值与潜能。从这个角度来看，竞技体育不仅是一项身体活动，更是运动赋权的过程，即

通过不断挑战自我、突破极限, 残疾人运动员打破社会赋予的“残疾”标签^[29]。

3.3 举社会之力: 以共生性社会为目标, 构建包容型体育生态

发展残疾人体育, 对于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推动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体育活动不仅为残疾人群体提供展示个人能力的机会, 还通过合作与竞争的形式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16]。于残疾人竞技体育而言, 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不仅在赛事的规模和影响力上取得突破, 更在社会包容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带来持久的积极影响——赛事结束后, 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改革为残疾人提供长期便利, 使得包括残疾人在内的诸多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这种改进也被认为是残奥会留下的“社会遗产”^[30]。事实上,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现代理念已经突破对传统残疾身体观的偏见, 开始强调对个体尊严和异己身体的包容与尊重, 拒绝对他者身体的贬损或侮辱, 倡导对整体社会成员的认同接纳、多元融合及和谐共生^[31]。

在人类体育文明演进图谱中, 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兴盛标志着体育发展的新高度。这一形态既体现体育伦理对特殊群体的终极关怀, 也揭示体育生态系统通过结构优化实现自我超越的内在规律。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审视, 残疾人竞技体育的勃兴不仅是体育文明的进步刻度, 更是社会包容性发展的晴雨表, 超越传统二分法思维, 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多元中构建共生。正如杭州亚残运会展示的科技赋能场景所昭示的: 当体育系统真正实现全要素包容性发展时, 必将释放出“1+1>2”的系统性动能, 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新的活力。这既是体育发展的必然规律, 更是现代社会不可推卸的文明责任。

4 结语

鉴往知来, 资政育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强调:“奥林匹克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盛会, 更是人类文化、教育和道德精神的体现。”百年来, 残疾人竞技体育实现从“运动处方”向“社会处方”的历史转型, 体现出竞技体育在提高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增进残疾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积极贡献。在此历史背景下, 残疾人竞技体育被赋予更多的社会功能, 为推动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提供新路径。百年来, 残疾人竞技体育的演进特征及其在价值、组织、活动之维的深刻转变, 是残疾人从

“康复对象”到“竞技主体”角色转变的重要体现, 是残疾人竞技体育在理念、方式与制度上全面性、系

统性、根本性的变革, 也是推动残疾人权利进步、无障碍环境建设与包容性社会发展的重要逻辑呈现。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 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落实残疾人权益保障、无障碍社会建设和全民共享体育的战略部署, 描绘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宏伟蓝图, 必须凝聚历史智慧, 汲取残疾人竞技体育百年历程中的宝贵经验, 坚持以体育实现残疾人和谐发展、消解污名与增强自信、促进多元包容与共生, 准确把握残疾人群体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社会需求, 并擘画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唯有如此, 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事业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勇毅前行, 开创更加辉煌的体育图景。

参考文献:

- [1] 求是网. 这个特殊群体, 总书记十分关心牵挂 [EB/OL]. (2022-06-22)[2024-11-11]. http://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22-06/22/c_1128765293.htm
- [2] 邵天逸, 李启迪. 从粗放走向规范: 我国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问题审思与路向转换[J]. 体育科学, 2023, 43(5): 89-97.
- [3] LORENZEN H. Lehrbuch des Versehrtensports[M].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61: 51.
- [4] THOMAS N, SMITH A. Disability, sport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8: 23.
- [5] DOLL T 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in sports for persons with a disability[J]. Sobama Journal, 2007, 12(1): 7-12.
- [6] BRITTAI I. Key points in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alympic games[M].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2018: 125-149.
- [7] GOLD J R, GOLD M M. Access for all: The rise of the Paralympic Games[J].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2007, 127(3): 133-141.
- [8] TWEEDY S M, VANLANDEWIJCK Y C.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position stand-background and scientific 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 in Paralympic sport[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1, 45(4), 259-269.
- [9] 文安. 从IPC田径分级卡的演进看残疾人体育分级理念的演变[J]. 体育学刊, 2015, 22(1): 54-57.
- [10] LEGG D, FAY T, WOLFF E,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Relationship: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2015, 39(5): 371-395.
- [11] MISENER L, DI L L. Changing parasport landscap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 governance[M]. London: Routledge, 2020: 217-228.
- [12] 关志逊, 成佳, 崔薇, 等. 面向 2020 年东京残奥会: 日本残障人体育治理[J]. 中国体育科技, 2021, 57(7): 3-10+84.
- [13] 中国政府网. 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和权利保障 [EB/OL]. (2022-03-03)[2024-11-11].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03/content_5676615.htm
- [14] GOH C L.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Paralympic Games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isabled persons into society? [J].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 2020, 20(1): 36-54.
- [15] 张军献, 虞重干. 残疾人观的嬗变与残疾人体育的历史回顾[J]. 体育科学, 2007, 27(3): 17-21+31.
- [16] 徐翔. 体育权: 一项新兴人权的衍生与发展[J]. 体育学刊, 2020, 27(4): 21-28.
- [17] MCCANN C. Sports for the disabled: The evolution from rehabilitation to competitive sport[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1996, 30(4): 279-280.
- [18] SILVER J R. The origins of sport for disabled people[J].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Edinburgh, 2018, 48(2): 175-180.
- [19] 桑国强, 吴燕丹. 论残疾人的体育社会化[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5, 27(2): 116-120.
- [20] WOLBRING G, LEGG D, STAHNISCH F. Meaning of inclusion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paralympic games and movement[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ety, 2010, 1(3): 81.
- [21] 于文谦, 季城, 呼晓青. 残疾人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培养问题剖析与路径优化[J]. 体育学刊, 2020, 27(4): 61-66.
- [22] SCOTT N H.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inter-spinal sports festival at stoke mandeville hospital[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ysiotherapy, 1956, 2(1): 34-35.
- [23] 贺幸辉, 王轶, 周喜艳. 残疾模式的演变与残奥会报道的新闻话语建构——以《人民日报》(1984-2018)残奥会报道为例[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6(1): 45-52.
- [24] 任海. 新残疾观视域中的残疾人体育[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2): 1-8.
- [25] 杨立雄. 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社会性障碍——基于社会-文化视角[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3): 1-11.
- [26] 新华网. 《妈妈的神奇小子》拍出了残疾人运动员家庭的艰辛和不易 [EB/OL]. (2021-09-13)[2024-11-11]. <https://www.xinhuanet.com/ent/20210913/fb4536ed7ae04df38e7cbcfc53609cb/c.html>
- [27] 金梅, 王家宏. 国际特奥会全球发展优先战略演进研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6, 28(6): 528-532+540.
- [28] 胡科. 运动哲学研究的身体动向: 回到运动现场与还原直接经验[J]. 体育学刊, 2019, 26(1): 13-19.
- [29] 张忠石, 王智慧. 撕掉“标签”: 视障跑者的具身显现[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8(3): 41-47+64.
- [30] 孙海潮, 孙葆丽. 共享发展理念视域下北京冬奥会遗产传承研究[J]. 体育学刊, 2023, 30(5): 16-22.
- [31] 于丽婧, 李辉, 程卫波. 身体视角下近现代西方残疾人体育思想的历史嬗变考察[J]. 体育学刊, 2022, 29(1): 25-29.

